

李清照词选

前言

关于李清照直接而可信的记载，只有寥寥数语：“（李格非）女清照，诗文尤有称于时，嫁赵挺之之子明诚，自号易安居士。”（元脱脱等《宋史·李格非传》）这其中连她的原籍何在、生于何时等等最基础的生平资料，均属阙如。所幸，对其原籍，新时期以来渐成共识，即北宋齐州章丘绣江（今属山东济南）。而对其生年的考论和争辩，从胡适、陆冯（陆侃如、冯沅君）算起，将近一个世纪迄无定说。笔者在已经出版的关于李清照及其《漱玉集》的数种论著中，均信从黄盛璋之说，认定李清照生于宋神宗元丰七年（公元1084，王仲闻《李清照集校注》亦取此说）。但是，在六、七年前，由赞同胡适等“公元1081年之说”的学者问难，形成了新一轮的争议。驳难者则赞同一向被忽视和冷落的浦江清和王 的“公元1083年之说”。笔者认为，公元1083和1084，虽然只有一年之差，但并不是通常所理解的“虚”、“实”岁之别，而是推导依据迥然不同之故。所以，现在认定“公元1083年之说”亟可信从。这样，对李清照的生卒年重新厘定为公元1083—1155？年。

近些年，随着史学界和古典文学界对宋史和有关李清照研究的深入，以及地下文物的频繁发掘和有关珍藏文物的面世，对李清照的身世，特别是其父李格非的婚姻状况引起了更多的关注和辩证思考。比如有关李格非妻室的记载，由原先《宋史·李格非传》和庄绰《鸡肋编》两种，现在又将《王貽神道碑》和“王拱辰夫人薛氏墓志铭”等，从史学和文物考古方面引入李清照的研究之中。尽管对上述一系列资

料的科学分析和进而全面准确地征引和借取尚未形成共识，但这些资料均堪称李清照研究中的“硬件”。

对于李清照的生母是何许人，迄今未发现直接记载，也就无任何“硬件”可言。有鉴于此，不妨从对有关“软件”的“发明”中加以弥补，从而作出相应的判断：

李清照往往给人一种“目中无人”、处处“拔份儿”之感，眼界、口气无不居高临下，比如她把官至礼部员外郎的父亲和两度居相位的翁舅，说成“赵、李族寒”；实际上，就是在晚年，李清照本人也属于那种“瘦死的骆驼比马大”式的富贵之家，然而却自称“家世沦替，子姓寒微”云云，这一切仿佛说明她以一个朝廷资深政要之家作为“参照系”，也就是说，执政十六年之久的宋神宗元丰宰相王卞是她的外祖父的可能性极大。还有一条未被深究的现成材料，即李清照在《上枢密韩公诗》并序中，自称“有易安室者，父祖皆出韩公门下”，这也很有可能是暗指王卞是她的外祖父。“韩公”，是指高宗绍兴初年的高官韩肖胄的曾祖韩琦（他在宋仁宗、英宗、神宗三朝为相）和祖父韩忠彦。李序中所谓“父祖”，父，指李格非，宋徽宗建中靖国时韩忠彦为相，是时作为礼部员外郎的李格非，或受到韩相的赏识及荐拔，自然是其“门下”。“父祖”中的“祖”，以往仅被理解为李清照的祖父，其实至少应该包括她的外祖父（王卞）。因为在韩琦知扬州时，王卞任通判，而李清照的祖父（“族寒”），至今无人知其大名。但是，关于韩琦和王卞的亲密关系，却有一段佳话：韩所在的扬州官衙花园里，一年，有四朵芍药花格外鲜艳、硕大，此系十年难遇之事。韩琦把四朵花中的三朵分赠通判王卞、签判王安石等三人（事见《舆地纪胜·扬州》）。“通判”位略次于州府长官，且含共同处理政务之意，说王卞出于“韩公门下”，顺理成章。

关于李格非的妻室，在上述四“硬件”之外，还有一种不应被忽略的“软件”，即根据有关记载分析，李格非当卒

于公元 1112 年或在此前后约一、二年，享年六十一。那么，在他熙宁九年（1076）中进士时，已经二十大几。李格非娶王洵长女时任郢州教授，是在其中举之后，约在公元 1080 年，抑或在此稍前或稍后，所以李格非在与王洵之女成亲时，已年近或年届“而立”。在我国古代，年近“而立”的男子尚未初婚的概率极小。因此，在娶王洵之女之前，李格非在原籍，当已初婚。那么，连同在他日后晋升为校对黄本书籍时（在绍圣元年之前、秦观卸此职之后）所娶王拱辰孙女在内，李格非前后可能有三房妻室。而作为长女李清照的生母只能是前二房中的一位。李格非既有在原籍娶妻的可能，也有生女的可能；任郢州教授时，又娶王洵之长女为妻，李清照也有出生于此时的可能；王洵长女早卒后，再娶王拱辰孙女为妻时，李清照约在十岁以上。而宋高宗建炎年间任敕局删定官的李籀，被李清照在《投内翰蔡公崇礼启》中称为“弱弟”，即幼弟。那么李籀当是李格非第三房妻子（至少是第二房）所生的、李清照的异母小弟（王昊先生在《词学》第 15 辑上曾发表《李清照“继母说”补证》一文，支持笔者此说）。

对李清照生母的确认，目前虽然只有“软件”作依据，但是在“硬件”“发明”之前，认定“以文学进身”的王洵，是文学天分出众的李清照的外祖父，这说不定在基因遗传方面具有一定的科学道理。这样一来，在李清照的生母“早卒”时，她有可能刚刚“落草”，最大也不会超过三、四岁。此时李格非在郢州教授的任期将满或刚满。又据晁补之《鸡肋集·有竹堂记》，直到李清照七岁那年，其父才在汴京租赁房舍。李格非在由地方低级学官晋升为太学录时，其在汴京一无家室二无房舍的情况下，不大可能携带幼女进京。而可能性较大的是李清照暂时被留在原籍，由住在今天山东济南章丘明水的家人抚养。大约在她十五、六岁时，才离开原籍来到汴京（今河南开封），“待字”择婿。

建中靖国元年（1101），李清照与二十一岁的太学生赵明诚（字德甫，又作德父）结为伉俪，一度生活很美满。未久，她的父亲李格非被列为“元 奸党”，而她势必会受到株连，很可能一度被迫回到原籍。在她重返汴京不久，赵明诚之父崇宁宰相之一赵挺之被罢官病卒。李清照便随赵家屏居青州（今属山东），在这里生活了十多年。这期间，她与赵明诚在“归来堂”中猜书、斗茶，花前月下夫妇相从赋诗，共治金石之学，又撰《词论》之文。因祸得福，人称赵、李“夫妇擅朋友之胜”，所指主要是这段光景，其伉俪之谐，几胜新婚。所以此时在李清照的笔下一无悲苦之作。此后，赵明诚连任莱、淄（今均属山东）等地知州。正在作为金石学家的赵明诚事业鼎盛，又转官晋升之时，汴京告急，其母卒于江宁（今属南京），赵明诚遂奔母丧南下。不久“靖康之变”，北宋灭亡。李清照由淄州返青州，筛选整理“归来堂”的巨额文物。其中十五车轻便贵重者准备立即南运，另有十馀间房屋所贮书册什物，准备明年再运往江宁。不料青州发生兵变，知州曾孝序父子遇害，上述十馀屋收藏便化为灰烬。看来，是李清照押运十五车贵重文物，并将蔡襄所书《赵氏神妙帖》，藏之于身，水陆兼程，中途遇“盗贼”“负之不释”，于建炎元年冬或翌年春抵达江宁，将书帖完璧归“赵”，赵明诚为之感动不已。在南渡江宁期间，李清照曾有雪天顶笠披蓑，循城远览寻诗之雅兴。由此可见，李清照命运的分野，主要不是“靖康之变”，因为在此后的一年多赵明诚膺任南宋军事重地江宁（后改为建康）知府，她作为江宁重镇最高军政长官的夫人，其心态之忧喜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夫妻感情之亲疏。此时的赵明诚或有“章台”之游，加之“缁城宵遁”，失职被罢，使得李清照的处境和心情，不仅与青州后期、莱州前期一样，时有“婕妤之叹”，对一个极有思想的知识女性来说，丈夫的不争气，给她造成的心灵创伤更是难以名状的。

宋高宗建炎三年（1129）二月，赵明诚被罢知江宁府，李清照陪伴他辗转于今天的苏、皖、赣等地择居安家，刚到池阳（今安徽池州），他便奉旨知湖州（今属浙江）。在他前往行在应召时，李清照乘舟相送，直送到舍舟登岸的六月十三日。赵明诚由于冒暑骑马奔驰，途中感疾。当李清照得知他卧病的消息时，急忙乘船一日夜行三百里前去探望服侍。赵明诚于建炎三年八月病卒，李清照悲恸不已，葬毕，她便大病一场，仅存喘息。金兵加紧进逼，时局十分危急。当时还有从青州故居运出的书二万卷，金石刻二千卷，及其他长物。李清照便托旧日部属将上述文物押运到洪州（今江西南昌），投奔时任兵部侍郎的赵明诚的妹婿。不料，洪州失陷，李清照所托运的大批文物化为云烟。正在此时，又发生了所谓“玉壶颁金”之诬，即传言赵明诚生前以玉壶投献金人，贿赂通敌，被人秘密弹劾。这使得李清照非常惊慌，就想把家中所有的铜器等物进献朝廷。当时宋高宗被金兵追赶得四处逃窜。李清照赶到越州时，皇帝已转到四明。这些铜器等不敢留在家中，就与手抄本一起寄存在剡（与前后文的越州、四明、杭州、金华等地，今均属浙江），后来都落入官军李将军之手。然而，觊觎李清照手中文物者，远不止“李将军”一人。赵明诚病卒仅一个月，高宗御医、奸佞王继先，想以黄金三百两的贱价购买赵明诚家的古器物，幸被兵部尚书谢克家奏请止之。时局日益紧张，大陆几无赵构逃匿之处，不得不在浙东上船入海奏事。建炎四年初春，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吓退了不习海战的金兵，宋高宗便由南逃泉州之想转而驻跸越州州治，李清照也随之来到了会稽（今绍兴）。

公元1131年，南宋改元绍兴，不久升越州为绍兴府，以年号为地名。朝廷如此看重“绍兴”二字，当取中兴发达之意。此时不仅朝廷大有转机，赵、李两家亦因缘而进。在此前后，高宗数次下诏褒录旧党忠贤，李清照的小弟在皇帝

身边备受重视，是年由宣义郎再升一官。来到“千岩竞秀，万壑争流”的会稽，李清照此时的心情是赵明诚去世以来不曾有过的宽舒。不料邻人钟复皓涉嫌穴壁盗去卧榻之下的贵重文物五竹箱。失窃后，李清照痛不欲生，不久又病倒了。更加不择手段的是张汝舟，早在安徽池阳时，他就觊觎赵、李带来的大批贵重文物。在李清照于重病之中从绍兴来到杭州时，他看到有不少空隙可钻——李清照此时病情十分危重，她的小弟单纯不谙世情；眼下除了他池阳张汝舟，还有一位誉满朝野的姓名雷同者，自己大可鱼目混珠。他为了攫取李清照的文物，就在她身患重病，牛蚁不分，已准备了后事之时，巧舌如簧地欺骗了李清照的小弟，与处在昏迷状态的李清照缔结了婚约。婚后一时未能将残存的文物弄到手，他就对她拳脚相加。由于此人是靠谎报举数取得官职，李清照便就此告发了他，他受到了编管柳州的惩处，而她由于告发亲人又必须依法服刑二至三年。为此她求助于赵明诚的表兄弟、德高望重的綦崇礼，九天后得以出狱。事后，李清照以《投内翰綦公崇礼启》谢之。

绍兴三年（1133）六月，朝廷派尚书礼部侍郎韩肖胄等官员使金。临行，韩肖胄母子以社稷为重，言行慷慨，感人至深。李清照缘此事而作《上枢密韩公诗》古、律各一首，古诗中有“欲将血泪寄山河，去洒东山一土”之句，足见其一片忠贞爱国的赤子之心。在经历了再嫁、离异、系狱风波后，李清照已年逾五十，住在杭州，日子稍有安定，她就着手整理赵明诚的未竟之著《金石录》，并撰成《〈金石录〉后序》。此序墨迹未干，她就听到了金、齐合兵分道犯杭州的消息，便于绍兴四年十月逃往金华避难。乍到此地，李清照心情很好，对生活颇有兴致。约半年后的绍兴五年（1135年）春夏间，她又写了一首十分伤感的《武陵春》词。从字面上看，此词抒发的仿佛是一种縻纬之忧；从情理上说，赵明诚逝世已经六、七年，最痛苦的时刻早已过去，再嫁离异

的风波也已平息。自己老之将至，不再为单纯的儿女私情所左右。此时她之所以又陷于了极端悲苦之中，想必与当时朝廷正在追究的一件事情有关。大约在绍兴四年，有一大臣向高宗进谏道：“王安石自任己见，尽变祖宗法度，上误神宗，天下之乱，实兆于此。”帝曰：“极是。朕最爱元。”原来，赵构以为《哲宗实录》系奸臣所修，其中尽说王安石的好话，对废辍新党的高、向两位皇后不利，而高宗又认为：“本朝母后皆贤，前朝莫及。”被皇帝认为“皆是奸党私意”的《哲宗实录》不能扩散出去。而赵挺之当年在参与编撰此录时所收藏的一部，如今恰由李清照保管。眼下《哲宗实录》被视为犯禁之书，窃窥、私藏都是违法的。（参见《续资治通鉴》卷一一四）命运就是这样无情地捉弄李清照，她像保护自己的头、目一样保护下来的书籍，又被朝廷下诏点了赵明诚的名，严令其家缴进此书。本来已趋愈合的有丧偶之痛的伤口，像是被撒上了一把盐，又加深了其难以摆脱的縻缠之忧。这使她原先打算好的双溪泛舟，再也无心前往，便流着眼泪写下了《武陵春》及其说愁名句：“物是人非事事休，欲语泪先流”、“只恐双溪舴艋舟，载不动许多愁”。大约于绍兴五年夏秋间，李清照便从金华返回杭州并定居于此。

早在建炎三年（1129）七月，将杭州升为临安府，当是赵构有意设下的一招苟安投降之棋，及至绍兴八年（1138），尽管在辞令上对临安仍称“行在”，而实际上已定都于此。抗战派人物如殿中侍御史常同等曾多次诤论定都临安之弊，更是不顾身家性命地激烈反对此一苟安之举。在一定的时代政治背景下，反对还是拥护定都临安，洵可作为抗战派和投降派的分水岭。李清照尽管毫无机会和资格参与朝廷旷日持久的定都之议，但是她深情怀念京、洛旧事的《永遇乐·元宵》词，正是一种以“忧愁风雨”出之的、再真诚不过的家国之念。

从李清照的寿限考察，在她年届甚至年逾古稀时，仍有某种行迹线索可寻，而从现存作品来看，在她六十岁前后仿佛已经搁笔。可以断言的是，李清照的过早搁笔，绝不是因为“江郎才尽”，相反，在其晚年，不但“神明未衰落”，而且依然精神健旺，欲以其学传授后人。她的搁笔，如同其谢绝“香车宝马”达官贵人的召邀，甘愿躲到“帘儿底下听人笑语”，也就是用孤独和沉默来表示对现实的不满和抵触，亦可见其“涅而不缁”的品格！她最终是抱着如同宗泽大呼“过河者三”的复国心愿和倾听着“伤心枕上三更雨”的“北人”思乡情怀，约于七十三、四岁时，在杭州离开人世……

李清照的创作活动大约开始于十六、七岁在汴京待嫁之时。其诗文多系缘大事而作，基本可以准确编年。她的词主要是曲折表达内心隐衷和儿女情长，原先只有一首寄情“姊妹”的《蝶恋花》标明确切的写作年月；本来《武陵春》也有明显的编年线索，但是由于人们对其中“双溪”所在地理理解不同，系年也就不同。直到黄盛璋以其历史地理学的确切考证，指出胡适的“双溪在今绍兴”之误，从而论定双溪在今浙江金华，此词才被公认写于绍兴五年春夏间，其他都没有编年。在《漱玉词》的诸多辑本中，影响最大、最可信从的两种分别是唐圭璋《全宋词》中的李清照词和王仲闻《李清照集校注》。前者所收47首中只有《怨王孙》（帝里春晓）和《浣溪沙》（绣面芙蓉）二者之真伪可议；后者宁缺勿滥只收43首（14首存疑）。二者的共同点是都未对《漱玉词》进行编年和分期。

笔者谨记陆侃如老师的教诲，并将老师对“中古”文学系年的某些“诀窍”移植于对《漱玉词》的编年。与此同时，有学者建议我细读了发表在《中国科学》（七十年代）上竺可桢的关于历史物候方面的科学论文。在此文的许多精辟见解的启发下，我搜集了自然和社会科学有关编年的诸多

资料，结合对《漱玉词》文本的反复解读和体悟，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，陆续将自己对《渔家傲·记梦》、《临江仙》、《诉衷情》、《清平乐》，特别是《声声慢》等词作的较有根据的编年公诸于世。

编年（分期）、辨伪是深入研究作家作品几不可缺的两大前提，在这种前提下，笔者厘定出现存可靠和较可靠的李清照词 47 首，本书所选 39 首均为名作和主要篇目，在这方面是谨遵本丛书之要求，但在总字数上却难以与苏、辛等多产名家大致平衡。要弥补这方面的不足，与其多收一些等下之词作，倒不如把被作家词名所掩的诗文名篇提供给读者。这便是编撰本书附录之初衷，这方面想必能够得到本丛书编者和读者的支持和理解。

李清照一生著作甚丰，生前即有刊刻行世，其诗文集见于著录和记载的名称卷帙不一，如《郡斋读书志》卷四下和《世善堂藏书目录》均谓《李易安集》十二卷，而《宋史·艺文志》则谓《易安居士文集》七卷；她的词在古代被称为《漱玉集》、《易安词》并有一、三、五、六卷不等。以上诗文及词集约在明末清初时散佚，现存李作均为辑本。

尽管李清照的诗文出手不凡，但她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，主要是靠“压倒须眉”的《漱玉词》确立的。对她的词，人们历来备加关注，品评多不胜数，这里仅举褒贬有所不同的二例：一是王灼《碧鸡漫志》卷二所云“（易安居士）作长短句，能曲折尽人意，轻巧尖新，姿态百出。闾巷荒淫之语，肆意落笔。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，未见如此无顾藉也。”二是李调元《雨村词话》卷三所云“易安在宋诸媛中，自卓然一家，不在秦七、黄九之下。词无一首不工，其炼处可夺梦窗之席，其丽处直参片玉之班。盖不徒俯视巾帼，直欲压倒须眉。”王灼对李词的贬抑，语意明白，无须诠释，而李调元之说意谓：李清照的词自成一家，不在秦观、黄庭坚之下，它的凝炼超出吴文英，它的清丽可与周邦彦的《片

玉词》媲美。她不仅在女子中首屈一指，甚至能够超过堂堂的男子汉。对比以上二说，显然李调元持论中肯，更为可取，而王灼对李清照其人其词的看法含有某种封建卫道成分，观点极为偏颇。

李清照的诗只存十多首，文仅有六、七篇。在创作特色方面，诗文迥异于词而紧密联系社会现实和特定历史人物或事件，风格豪迈，语言犀利，锋芒毕露。李清照诗的影响虽然不及其词，但对《漱玉词》极尽攻击之能事的王灼，对她的诗却称赏不已：“自少年便有诗名，才力华赡，逼近前辈。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，若本朝妇人，当推文采第一。”（《碧鸡漫志》卷二）

关于李清照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如何，人们通过本书对其有代表性的诗词文赋的具体解读，自有心裁，这里着重介绍的是她对前人的嗣响和对后人的沾溉。

以往多把李清照的文学才华归结为受其“善属文”母亲影响，现既已判断其母最晚在她一周岁左右去世，后天谈不上对她有多少影响，至多是文学基因的某种作用。这或许还可追溯到她的外祖父王洙。王洙自执政至宰相，历时十六年。他自幼奇警，出语惊人，以文学进身，“其文閎侈瑰丽，自成一家，朝廷大典策，多出其手，词林称之。”（《宋史》卷三一二）但更重要的是后天受其博学多才、正直清廉的父亲及其著作的影响和教育。从她现存作品所用故实看，她读过的书难计其数，文史哲无所不包，所受影响是多方面的。她不仅是文艺多面手，还是学养深厚的思想家。单就文史典籍而言，对她影响较多的计有下列诸种：

李清照之于《诗经》不是一般化地阅读和记忆，而是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稔悉程度，有着若干深邃而新颖的见解。比如其《感怀》诗中“公路可怜合至此”的“公路”，既有某种可能取自《三国志·袁术传》裴注引《吴书》中袁术（字公路）的一段经历“说事儿”，或拿来自比；而可能性更大

的是作者对《诗·魏风·汾沮洳》的隐括。因为《汾沮洳》中称呼廉洁的贵族官吏为“公路”。李清照用“公路”来比喻与天子同姓又身为知府的赵明诚，该是多么恰切和善解“良人”之意！又如《声声慢》中的“晓来风急”，当是化用《终风》的“终风且暴”的深层训释之义，而《诉衷情》的“夜来沉醉卸妆迟”和“人悄悄，月依依”，则是分别隐括了《柏舟》的“微我无酒，以敖以游”和“忧心悄悄”之句意，只不过这种化用和隐括就像盐溶于水无影无踪。对她这类词作的解读，需调动研究者本人的灵感。

有一首生动地反映待字少女心态的秋千词《点绛唇》，曾被不少论者怀疑，甚至屏于《漱玉词》之外，原因是：一把“倚门回首”解作“倚门卖笑”。其实“倚门”语出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的“刺绣文不如倚市门”。司马迁是以此说明“农不如工，工不如商”的道理，而“倚门卖笑”是后人的演义，以之形容妓女生涯系晚至元代和清代。况且此词中的“倚门”句，只是靠着门回头看的意思，不必有何出典。二是认为名门闺秀的李清照不可能演韩诗（指李词中的“见客入来”诸句系演韩《偶见》诗）。这是对李清照所受韩骥《香奁集》的影响未加深究所致。《漱玉词》与韩诗有关之处颇多，较明显的尚有咏海棠的《如梦令》系演韩骥《懒起》诗的“昨夜”以下三句而来。

清人杨文斌所编《三李词》，收录的是男中李后主，女中李清照及前此李太白的三家词。鉴于现存李白词尚有异议，李清照所受太白影响有待进一步探讨，而她所受李煜词的真挚深情、以血泪书写的影响却是极为明显的，郭沫若称这种影响为“文采有后主遗风”。不仅是“文采”，李清照的漱玉清流和李后主的“一江春水”，当是出自同一“泪泉”。

李清照对前人的借鉴，有时看似手到擒来，一旦“拿来”放在她的作品中，往往比在原作中更有光彩，如《念奴娇》的“清露晨流，新桐初引”和《小重山》的“春到长门

春草青”，是分别出自《世说新语·赏誉》和五代薛昭蕴同调词的成句。比借取成句更妙的是对前人词旨和现成意象的借取和发展，比如她写于江宁的《诉衷情》，所承续的当是《花间集》中毛文锡的两首同调儿女情事词。又如在《诉衷情》和《清平乐》中都曾出现的“梅”意象，便是以冯延巳《谒金门》词所刻画的那个“终日望君君不至”的宫女的“手”之物为典的，李清照把宫女所揉搓的“红杏蕊”改为梅之残蕊，就与她本人的“情结”更为契合。

李清照对后人的影响也是多姿多彩的。且不说历代酷爱和研究其作品的人多不胜数，名列大家之前茅，直接在“易安体”的“哺育”下成长起来的著名作家也大有人在。比如，稍后于她的东武（今山东诸城）籍词人侯蠆《眼儿媚》（花信风高），便题作《效易安体》。陆游虽没在作品中标出“效易安体”，但他与这位前辈颇有同病相怜之苦：除了政治上或受株连或被压抑之外，在感情上也各有隐衷。在陆游的“沈园”、“梅菊”、“姑恶”诗中，不仅时有《漱玉词》的用语和意象，其旨亦多有埒同之处。再一位就是极力效仿“易安体”的辛弃疾，这不仅表现在对她“以寻常语度入音律”等方面的效法，更主要的是思想感情的一致。不难看出，辛弃疾以名句“众里寻他千百度”等等著称的《青玉案》，与李清照的《永遇乐》词完全是一脉相承的。然而更能体现李清照作品巨大影响的事情竟发生在张居正身上。这位明万历年间当国十年的首辅，有一天他听到部吏中有一姓钟的操浙江口音，便问道“你是会稽人吗？”答曰“是的”。张脸色遽变怒气久久不消。这个部吏解释说“我是新近从湖广迁来的。”即使这样张还是把他开除了。这虽然类似于小说家言，但很能说明《〈金石录〉后序》的深远影响，因为其中所记载的钟复皓，就是涉嫌盗窃李清照文物的梁上君子！

在李清照研究中，有许多问题尚未达成共识，比如作品

的真伪、系年，生于哪一年、生母是谁等等均有不同说法，其中分歧最大的莫过于再嫁问题。按说南宋洪适《隶释》所云“赵君无嗣，李又更嫁”、南宋赵彦卫编著的人称“赅博可信”之书《云麓漫抄》所著录的李清照《投内翰綦公崇礼启》，都是李清照再嫁、诉讼、系狱诸事最雄辩的证据，但是那些把“持再嫁说”看成厚诬李清照的人，在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下，硬说《投启》是经人篡改，甚至是伪造的，其说难以服人；在宋人的另外七、八种关于李清照再嫁问题的记载中，虽然有的也认为再嫁是失节的，并指责她“无检操”（晁公武语）、“晚岁颇失节”（陈振孙语），但却从反面证实了李清照确有再嫁之事。而明朝以来才出现的，把记载李清照再嫁之事说成是“厚诬”她，则是不顾史实的强词夺理，实际是站在卫道立场的“帮倒忙”。

另一个是近十年来出现的问题，即随着李清照生平资料的新发现和对其词作暗含典事的破译，势必要对其履历有所改写。即改写以“靖康之变”为分野的前后二期说为早中晚三期说。从宋神宗元丰六年，到徽宗大观元年，屏居青州之年止，共二十五年为前期；从大观二年到高宗建炎三年赵明诚去世之前的二十一年为中期，也可称作青、莱、淄、宁时期；从建炎四年到绍兴二十五年为后期。本书所采用的就是这种三期说，它对李清照的作品系年、解读大有裨益。

陈祖美

2003年5—6月于北京

如梦令¹

尝记溪亭日暮²，沉醉不知归路。兴尽晚回舟，误入藕花深处³。争渡，争渡⁴，惊起一滩鸥鹭⁵。

【注释】

1 如梦令：作为词调（又称词牌），其原名《忆仙姿》。苏轼《如梦令》（水垢何曾相受）一词注云：“此曲本唐庄宗制，名《忆仙姿》，嫌其名不雅，故改为《如梦令》。盖庄宗作此词，卒章云‘如梦，如梦，和泪出门相送’，因取以为名云。”关于词调、词牌问题，有一说颇可参考，因其书不常见，兹录于下：“词牌有各种不同的气息与音调，有缠绵悱恻的，有慷慨激昂的，有谐婉闲适的，对于抒发何等感情，描写何种事物，在选调上，就显得十分重要。例如《满江红》、《水调歌头》、《八声甘州》以及连用三字句的《六州歌头》，多四字句的《沁园春》等，音节都极沉雄高亢，最宜于怀古感事。《临江仙》、《蝶恋花》、《鹧鸪天》、《浣溪沙》等婉转清脆，最宜于写景抒情。《寿楼春》、《忆旧游》宜于咏春思，《齐天乐》、《霜天晓角》宜于咏秋景，诸如此类，学者多读前人作品，自能体会。”（陈声聪《填词要略及词评四篇》第27—28页，广东人民出版社，1986年6月版）

2 溪亭：一说此系济南七十二名泉之一，位于大明湖畔；二说泛指溪边亭阁；三说确指一处叫做“溪亭”的地名（因苏辙在济南时写有《题徐正权秀才城西溪亭》诗）；四说

系词人原籍章丘明水附近的一处游憩之所，其方位当在历史名山华不注之阳。因为“历城北二里有莲子湖，周环二十里。湖中多莲花，红绿间明，乍疑濯锦。又渔船掩映，罟罟疏布。远望之者，若珠网浮杯也”（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前集卷十一）。大约在李清照十五岁时，按照相传的风俗，要用簪束发，叫“上头”。“上头”日要选在天气和暖之时，以便外出游乐。“婉婉新上头，湔裙出乐游”（梁简文帝《和人渡水诗》）。禀性极喜烟霞游乐的女词人，其终生记忆犹新的这次溪亭之游，或许正是上述古老风俗的沿袭，亦当是她从故乡湖山佳境中，所汲取的最初的创作素材。

3 藕花：荷花。

4 争渡：即“怎渡”的意思。

5 “惊起”句：言因慌忙划船，夺路急归，从而打破天籁宁静，惊起荷丛深处之栖息水鸟。鸥鹭，泛指概称鸥鹭的水鸟。

【解读】

此词起拍之“尝记”二字，喻示词非当时当地所作。作者约十六七岁到汴京，二十五岁时，翁舅赵挺之被罢相，不久她便随夫家“屏居乡里十年”，离开京城，也离开了与她有诗词唱和之谊的前辈晁补之、张耒等人。赵明诚是金石学家，“屏居”初年，李清照的创作雅兴，一度转移到与丈夫共同搜集、整理、勘校金石书籍方面。所以此词当是作者结婚前后，居汴京时，回忆故乡往事而写成的，也就是词人十六七岁至二十三、四岁之间的作品。细审作者行实，此词大致可系于她十六岁（宋哲宗元符二年，公元1099年）之时，是时她来到汴京不久，此词亦当是她的处女之作。其初试文笔，便出手不凡。此作竟被有些版本当做苏轼、吕洞宾等大家、名流之手笔。这再生动不过地说明，词人及此作堪与“须眉”、仙人相匹敌。

这首也被题作“酒兴”的记游词，在一些古人的眼中被视为带有仙气的豪迈之什，今天则可称它为极具逸兴壮采。能够写出如此豪放之作的李清照，人称“易安倜傥，有丈夫气，乃闺阁中之苏（轼）、辛（弃疾），非秦（观）、柳（永）也”（沈曾植《茵阁琐谈》，《词话丛编》第3605页）。李清照惟其有丈夫之气、文士之豪，其词风总的属婉约派，但在她现存的全部词作中，不仅没有那种“雌男儿”笔下的脂粉气，有些还可以划入豪放之列。这其中除了《渔家傲》（天接云涛）之外，一些写山川风物的词，如这首《如梦令》，也是词人豪情逸兴的写照。这首只有三十三字一气呵成的小令，其景象非常开阔，情辞极其酣畅。作品的这种豪迈气度，固然与作者的气质有关，但是气质也不完全是天生的。壮阔的齐鲁山川，珍珠般翻滚的故乡明水数不清的活水甘泉，为词人提供了驰骋豪兴遐想的前提，涵育了她的胸襟怀抱。李清照那种独有的投身大自然、钟情于山水风物的童心和志趣，与其壮怀激越的作品，在一定意义上是相通的。通过这首小令，还可以获得对词人思想性格的更为全面的认识：即使她的早期作品，也不都是表达所谓怜花惜春的闺情。她的生活视野，有时也在闺房以外，当她的的小舟驶入“藕花深处”时，也会像“惊起一滩鸥鹭”一样，给当时的词坛带来一股清风。事实上，李清照有一些体物、记游、抒怀词，不论就题材的选择，还是由此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特色，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，被口碑相传为“独树一帜”（陈廷焯《白雨斋词话》卷六，《词话丛编》第3909页）。

此词的另一主要特色是语言的明白如话，可以说一读就懂，却又有令人百读不厌的魅力。由这首词所体现的“易安体”的基本特征，似可归纳为：它创造了一种比人籁更进一步的天籁境界，也就是不事雕琢，得自然之趣。人籁、天籁，原是《庄子·齐物论》的用语，前者指由人口吹奏管龠发出的声音，后者是指自然界的音响。你看，天黑下来了，